

袁盛勇 著

鲁迅：
从复古走向启蒙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袁盛勇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袁盛勇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7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2288—9

I. 鲁... II. 袁... III. ①鲁迅(1881~1936)—思想评论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780 号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著 者/袁盛勇

责任编辑/陈宁宁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徐曙蕾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b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四厂

版 次/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8

印 数/4000

ISBN 7—5426—2288—9

I·278 定价:20.00元

总 序

钱谷融

上海三联书店的陈宁宁编辑要我为他策划、即将出版的《三联文博论丛》写序，作者大都是学术新人，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说实话，我是很有些惶恐的。记得很多年前，当教育部决定要在大学文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碰到北大的王瑶先生，他对我说：“要我指导博士生，但我连博士生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指导呢？”现在上海三联的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极广，有许多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哪有我置喙的余地呢？继而一想，人家不过是找你写篇序，又不是要你写评论，何必这样惶惶然呢？那么，就随便谈点个人的希望和想法吧！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不少新人，他们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研究生，有博士，也有硕士。他们年轻，充满了朝气，常能作出一些想前人所不敢想、发前人所未曾发的建树，学术的前进和发展，主要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堆柴垛，后来者不一定就能居上，一切有赖于自己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只有钻研

得深了,才能把握对象的本真,才能有新的创获。想来年轻的朋友们,总该不会因自恃来日方长而因循怠惰下去吧!

其次,学术上的某种创见,在它初出现的时候,不一定就很完善,它往往只是露了一点苗头,还有待于大家的扶植与灌溉。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爱护它、帮助它顺利地成长是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倡议者尤其不应就此撒手不管。

再有就是前些年也不断见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被出版,但都是零星的、个别的,这套《三联文博论丛》却较为集中地展示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文学博士们的新成果。他们的成就和水平,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的欠缺,一一都展露在人们的眼前,可供今后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参考。当然,这是有赖于各方面读者的不吝赐教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二〇〇六年二月改定

序

孙 郁

深秋的一天,袁盛勇兄到鲁迅博物馆来,便自然认识了。知道他的名字,是从我们的刊物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延安时期鲁迅传统意识形态化形成一文开始的。刊发之前,我看过大样,印象很深,觉得颇有见识,文中发前人未发之言。怕生歧意,在未征求意见情况下,我删掉了些文字。改动之前,也曾犹豫了半天,现在想来,是要向他致歉的。因为这露出了我的旧病,首鼠两端,踌躇不已,其实是读书人的痼疾。袁盛勇大概没有这些顾虑,洒脱而清峻,言之成理又不张狂,文中有着冷静和分寸。时光静静地流着,总有新而有锐气的人涌现,多一些新的面孔。当不怕虎的牛犊冲上来时,平静便被打破,思想或许也诞生于此中。

现在,他的专著《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就要出版了。读着厚厚的书稿,心也随之跳动。在思辨与冥想之间,也有人间的大的悲欣在。袁氏注视鲁迅,有自己的眼光,不像一些人跟着风向跑。他对鲁迅文本是熟悉的,身后又有哲学与史学的背景,读起来没有单调之感。比如谈鲁迅留日时的思想,就有复杂的考虑,伦理、民族性、人本主义、科学、迷信等等都进入了自己的视野,且与鲁迅的意识碰撞着。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是个殊难谈的话题,作者却自如倾诉着,不时有着意识的闪光,读着读着,眼前一亮。日本友人木山英雄不久前来鲁迅博物馆,也谈到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他有一本新出的书题为《文学的复古与文学革命》,多见妙论。袁氏大概没有读过这书,但个别地方,有相似之处,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木山英雄谈文学复古,是以章太炎与刘师培为中心,袁盛勇的目光集中于鲁迅那里,其中也言及于章太炎诸人。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梳理清了,历史的迷雾才会被穿透过去。这就要用去很

多心血。周作人当年也谈及到类似话题,不过点到为止,未得细谈。现在已有人于此用力,大家的话题也丰富起来了。较之于过去的单调,今日的时空是不断扩展着的。

鲁迅的文本难谈,这是大家知道的。而关于他的接受史,亦有挑战的地方。鲁迅之于后人,是个大课题,其中隐含着文化的苦运。每每回望,多见苍凉,诉之者不禁为之长叹,这是别的作家未有的现象。袁氏治学,无象牙塔的呆气,书卷气中,又多现实关怀,论述鲁迅研究玄学化与贬损现象时,忧患深深。研究对象的心绪也传染了他,以至有着浑厚之气。有人曾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易接近鲁迅了。这一本书却可以回答上述的观点。后鲁迅时代,照例有着精神的拷问带来的肃杀。人无法抹去旧有的记忆。活在今天的人们,还罩在鲁迅式的宿命里。一代又一代人重复着,摆脱着,但终于还在旧地盘桓着。

年轻时读到周作人的文章,写着历史的循环,言曰太阳底下无新事。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又如斯。像是咒语。那时不解此句,现在渐渐明白了。想起陈寅恪那本《柳如是别传》,三百年前旧事勾勒得细致有味。读罢欲哭无泪。晚清之事亦今日之事也,学人独步其间,不过略抒愤懑,言己身之苦罢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未脱此境。自王瑶、李何林那代人起,就无经院色调,学术也是人生,在与远去的灵魂交流时,难道没有今日的投影?钱理群写文学史,就带着焦虑。自我的体验也折射了进去。现代文学乃人生的镜子,照着过去,也照着今人。赵园当年有一本《艰难的选择》,读它时正在大学用功,一时顿开茅塞。它的吟诵与苦诉,是“文革”风雨后的一道精神闪光。借着五四而谈人谈史,不难看到也是讲自己这一代人。学术要静谧与冲淡,在我们这个环境确乎很难。

看别人写人写事,对自己也是个镜鉴。描述鲁迅的人很多,却千姿百态,殊少重复者。所以也相信每一本书都有作者的心史,只不过有着或浓或淡,或隐或显之别。王国维论《红楼梦》,那也是解析自我的一部分,在冲动的文字间,也有客体的主观化吧。至于论述鲁迅的,例子更多。读袁盛勇之书,深信于此点,想必读者也会认可的。

2004年11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 1
序	孙 郁 1

第一章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1

一 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	1
二 鲁迅留日时期的传统文化意识	31
三 实效至上、科学精神与理想人性	42
四 政治性: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59
五 “国民性”批判的困惑	70
六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局限性	77

第二章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叙事 89

一 《狂人日记》: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89
二 《补天》:人与神的碰撞	98
三 《离婚》的叙事分析及其文化意蕴	104
四 萌发与沉落:自我意识与鲁迅小说中的死亡	111

第三章 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 118

一 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118
-----------------------	-----

二 鲁迅杂文传统的转换	125
三 政治性:毛泽东的鲁迅观	135
四 诠释与转换:鲁迅传统意识形态化的形成	143
第四章 当代鲁迅研究的批评与反思	159
一 灵魂的倾诉与反思	159
二 寻找历史的参照	168
三 在经典性和历史性之间	174
四 平实中含蕴了真精神	183
五 试图走向鲁迅的本体世界	191
六 盛满黑色记忆的火燃烧着	201
七 九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玄学化倾向	223
八 二十世纪末“贬鲁现象”的回顾与反思	233
主要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46

第一章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一 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

七年留日生涯(1902—1909)无疑是鲁迅思想渐趋个性化的关键时期。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仿佛是他后来思想的生长点,既给了他的思想发展以种种桎梏与限制,又给了他的思想发展以种种启迪与推动。鲁迅诗云:“翘首东云惹梦思”(《偶成》);又云:“心随东棹忆华年”(《送增田涉君归国》)。这正表现了留日时期在鲁迅心中难以移易的独特价值与地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回顾留日时期的思想历程时说:“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①这句话其实为人们理解他当时的思想特征提供了一把钥匙。我认为,唯有正确地运用这把钥匙才能打开他留日时期的智慧之门。“复古的倾向”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虽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但是,经过鲁迅卓越的理性审视,它无疑在鲁迅的文化建构活动中呈现出一幅独异的画面。那么,这幅画面是如何形成的?其内涵又当怎样?它在鲁迅早期思想中有何价值与地位呢?本节即是想从青年鲁迅缠绕其间的有关文化脉络入手,着重探讨他当时的“复古”倾向,并在此之上,展现他富有原创性的思想风貌。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一）民族主义与复古倾向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建构及其个性启蒙活动的开展,同近代中国大多数富有变革热情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初都有着一个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民族主义的内在冲动,促使青年鲁迅热切关注着祖国“风雨如磐暗故园”(《自题小像》)的历史现状,激励他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而且在我看来,这也将会成为导致鲁迅意识深处价值转变的主要动因之一。可以说,青年鲁迅极大部分创造热情的奔发与喷涌,一定程度上正根源于此。这些特征在鲁迅一开始进行文化建构与启蒙时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在当时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内在地含蕴了鲁迅当时之所以具有文化“复古倾向”的全部奥秘。这恰如周作人所言:“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①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指向在不同层面上均广泛受制于当时占有一定地位的政治—文化等社会思潮的相继兴起。因而,研究民族主义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内涵及其影响就必须从深入人心的当时的政治—文化事件及社会思潮来进行探询。现在,尤其当青年鲁迅作为一个时代较有典型意义的个体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就更须与这种探询结合起来,在二者的融汇考察中凸显他曾经受到影响的普遍社会思潮及其自我选择与整合的艰难历程。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留日学生日渐增多,思想亦日趋活跃,其间一个显明标志便是自行创办了大量报刊。^②在以黄帝子孙自诩的中国学人那里,本来似乎天生具有的那种强烈的民族本能,现在经了这些报刊媒体的运作,表现得更为充分了。但是一般而言,留日学生刊物创办伊始,并没有立即着手排满革命的宣传,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的发动上。这就是说,留日学生的

^① 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上》,《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② 如创办有《译书汇编》(1900)、《国民报》(1901)、《游学译编》(1902)、《湖北学生界》(1903)、《江苏》(1903)、《浙江潮》(1903)等。

民族情绪最初一度表现在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上。因为这时的中国,经了西方列强的严威厉逼,愈益显得岌岌乎可危了。这恰如鲁迅所言,“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①由于对祖国危亡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大多具有忧患意识的学生都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一名词开始在报刊上频频出现。留学生对于这一名词的解释大都突出帝国主义的扩张性、侵略性,把帝国主义阐释为“侵略主义”、“膨胀主义”、“扩张版图主义”。^②留日学生对于帝国主义流露出来的激愤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不甘屈服于外来列强的反抗行径。在这一爱国救亡热潮中,最足以表达广大知识界爱国心声的,便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报刊创办伊始即热衷于这一主题的宣传。1903年4月间,留日学生还激情满怀地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提倡军国民主义。激进的留学生无不强调“尚武”、“进取”精神的积极作用,并以此批判民众的奴隶主义和顺民思想。应当说,鲁迅也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了这一爱国救亡宣传运动之中。他的最初编译性的创作——浪漫传奇《斯巴达之魂》——就是题献给那些热诚的爱国者并以此激励民众奋起救亡图存的。传奇鼓吹的就是一种大丈夫誓当如此的“尚武”精神。《中国地质略论》虽说是一篇介绍中国地质及矿产资源状况的科学论文,但鲁迅的旨意显然并不在此,而在于谴责沙俄等外来侵略者对中国矿产资源的覬觎和掠夺,并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所以文章开篇即洋溢着一片爱国热情:“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并且义正辞严地宣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觎者也。”结尾更是不胜感叹,并以此点明题旨:“吾将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③当然,《中国地

①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② 斟癸:《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 Imperialism》,《浙江潮》第6期“附录”。

③ 以上引文均见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17页。

质略论》也透露出了另外一个意向,即科学救国的主题。作为爱国思想的表现之一,“图富强”是当时留日学生的共同心愿。《说钼》、《科学史教篇》等论文译述一脉相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主题。

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随着对于清政府腐败本性认识的加深,激进留学生中终于掀起一股“叫嚣恣肆”^①所向披靡的排满革命怒潮。^②其实,这种思想早已蕴蓄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心中。甲午战后,明末遗老的作品被革命派人士编印出版,鲁迅说这是为了“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③革命派人士自己撰写的著作也纷纷面世,它们大都以光复汉室为干,意在激发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恨,坚定人们反满的革命意志。在这些著述中,邹容的《革命军》更是响起一片“雷霆之声”,它那“辞多恣肆无所回避”^④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无以估量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言,“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⑤鲁迅对于上述著作的影响之所以记忆犹新,主要原因便是鲁迅当时已经置身其中,感同身受。但是应当说,鲁迅的排满思想并不是到达日本以后才萌发,其渊源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据鲁迅本人回忆,他在孩童时期便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剃头人”故事中得到了志在排满的启迪。另外,据说鲁迅早在三味书屋念书期间便已饱览了明季遗老的志在光复的著作。^⑥这些阅读体验无疑为鲁迅的种族感情和种族意识埋下了更为深沉的种子。待到南京求学,由于受尽了旗人的辱骂,心灵深处更是雪上加霜,对于满人的痛恨愈加具有了深刻的个人体验。所以在鲁迅赴日之前,种族意识在鲁迅心中淤积得已有相

①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3页。

② “排满”思潮横行于近代前70年,是民族主义思潮中非常重要的支流。前后经历了“反清复明”、“反清兴汉”、“反清维新”、“反清革命”四个阶段。最为狭隘意义上的“排满革命”是指章太炎式的种族革命。

③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1页。

④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汤志钧编,第192-193页。

⑤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1页。

⑥ 参阅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页。

当程度,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他对“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①正因如此,当鲁迅抵达日本后,排满思想才会引起他的莫大共鸣。那时他与同窗好友相互勉励,“鼓吹革命,志在光复”。^②1903年春,鲁迅毅然在弘文学院学生中率先剪去辫发,便是一种不甘“奴于异族”的反抗情绪的表现,自然也是早年萌发的排满民族革命思想所结的硕果之一。鲁迅之所以憎恶头上的辫子,最深层的原因当是辫子本身即为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象征与缩影。至此,我们也更能理解鲁迅后来所以景仰太炎先生并投身其门下,当是真如鲁迅所说,只因太炎先生不仅是一位“有学问”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志在“排满”的“革命家”。^③

由此观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近代民族革命思潮主要是针对两个不同的指涉对象而言的,对内是推翻“满清”政权,对外是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两重因素在青年鲁迅心中交相激荡,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怀。

罗素曾经指出,在18—19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兴起,人们普遍感觉到一个民族必须具有凝聚力的“团体魂”存在。这一民族主义精神尤其在日耳曼民族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一度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总原则。^④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大约受欧洲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故而在激进的知识界广泛开展了“陶铸国魂”^⑤的宣传。陶铸国魂就是指要重铸一种能够担当救亡重任并以此拯救国家衰颓的民族精神。甲午战后,随着日本与中国间文化关系“逆转”态势的形成,日本人对中国愈益显示了一种普遍的蔑视心态。鲁迅分明敏感地捕捉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仙台所写并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封信中说道,那时

①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

② 沈颢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

④ 参阅[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6页。

⑤ “国魂”或称“黄帝魂”、“汉魂”、“民族魂”等。

日本同学来访的颇不少,但因他们大多属于所谓“阿利安人”,故“亦殊懒与酬对”。这里,鲁迅显然对日本人以高贵的雅利安人(即阿利安人)自诩深表不满。因而他更加坚信,虽然日本青年颇有“社交活泼”的优势,但是“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因此鲁迅“以乐观的思之”,认为“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①显然,鲁迅于此明确提出了“黄帝之灵”的问题。应当说,这是鲁迅立足民族主义立场,对于革命派陶铸国魂运动的回应。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诬蔑——说中国人为劣等民族低能儿——鲁迅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忘怀。那么,怎样才能重铸国魂呢?在当时人们看来,这要借助于华夏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这样,在民族主义这一总背景下,传统文化与重铸民族精神的内在关系便自然关联起来。正如当时人们指出的,“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入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此培养爱国心之不二法门也”。^②章太炎更是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影响于国家之存灭。”^③国人所以萎靡不振,只因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因而只有让人们了解汉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④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不论是激进的爱国志士,还是力举排满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大都强调如果要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就必须重塑民族精神。而只有传统优秀文化与历史才是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主要精神源泉,这似乎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也是当时民族主义各种表达方式间的共同特征之一。因此,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无疑导致了复兴传统文化思潮的持续兴起,其结果便必然是,民族主义思潮与复兴传统文化在内在意义上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二者纠缠一起,互为依托。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他们留日时期大都带有一些“复古的倾向”,乃是自然

① 鲁迅致蒋抑卮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② 《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③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民报》第7号。

④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汤志钧编,第272-276页。

而然的事情。

仔细考察之后可以发现,鲁迅留日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弃医从文之前,鲁迅尽管对于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残酷已多所认识,并且认为“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①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就总体而言,他的最初著述中还没有坚定地反对当权政府以及由此组建的国家(State),他所激烈批评的还只是局限于清政府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只是某些里通外合的卖国洋奴。^②因此,他那时所言的爱国也如当时留日学生的情绪一样是浮躁的,在理智上还没有把当权政府所代表的国家(State)与由一群因共同传统与命运为了某个共同目标而组建的民族—国家(Nation)完全理性地区分开来。^③这样,在他当时具有的爱国维新与光复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之间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断滑动的中间场域。应当说,这种状态在当时留学生中普遍存在。所以,我曾试想,如果清政府在它即将灭亡的最后几年里,把后来史称“新政”的变革样式做得更加像样一些,贵族化的权能占有有节制地退回到幕后一点,对于外来侵略者表现出坚定的主权信仰,那么,当时知识界特别是政治素养还较为稚嫩的留学生是有可能更为热切地献身于当时的State的,至少,由于倾向于遏阻外来侵略者这一迫在眉睫的救亡活动,也会淡化对于State的冲击。因此,结合上文的分析,我认为,鲁迅留日生涯最初几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当时留学生的普遍水准。这就是说,鲁迅民族主义的思想深度并不表现在他所具有的爱国情怀与排满观念上——因为这是当时大多数富有变革倾向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道德情操——他的独异之处在于,大约以重返东京为标志,他最终超越了这种浮躁化的思想而把其锐敏的思维触角延伸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深处,借助这种文化

①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6页。

② 如《中国地质略论》仅是批评一些官僚商人(如浙绅高尔伊等)的卖国行径,仅是批评清政府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引盗入室”,目的在于唤起有识之士“结合大群”开采矿藏。似仍停留在实业救国的认识水平上。

③ 在中国,传统“国家”与“君权”同位,“国—君”二位一体;它只有“王天下”观,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国家主权的概念直到近代才衍生。我在此试着把清朝政府叫作State,把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称作Nation,以示本质上的区别。

民族主义的生成,鲁迅才在更高的意义上真正开始了独特的文化建构活动,他所由此而具有的“复古倾向”也才真正显现了自身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鲁迅所在。

的确,民族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极难明晰界定的概念。林毓生曾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基于“中华民族同一性”的认同之上,而“这种同一性可以说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给予或者说强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与欧洲民族意识的产生机制不同,“中国的民族意识并非产生于内部的历史演进,而是来自外部的创伤性的打击”。^①如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才给明确划定了一个近代民族意识由以产生的政权与地域边界,这是颇为中肯的。但是这种论述仍然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定内涵作出准确描述。应当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本土的传统民族意识资源,一个才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由于这种双重民族意识资源的制约,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呈现了极大的复杂性。传统民族意识根源于春秋时代即已产生的“夷夏之辨”,如《左传》所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中国历史上对待民族问题的传统看法。我们知道,青年鲁迅在1906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已经表现了极大的人道主义同情,因此,在鲁迅当时的理性观照下,意味着种族歧视与暴力狂欢的章太炎式的排满思想是与其“兼爱”的伦理信仰格格不入的。因而,在怎样的前提下,才能合理地否弃太炎先生排满思想的狭隘性,就成了青年鲁迅文化建构思路中的应有之义。其实,就中国古代民族观的渊源来看,“夷夏”不仅标志着种族的分野,而且更是一种文化独断论的表征。^②这就是说,坚守夷夏之防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显然内在地植

①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01页。

② 冯友兰曾经着意提到《公羊传》主张中国和“夷狄”的区别不是以种族为标准,而是以文化为标准的说法。此外,翦伯赞等人认为:“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以上分别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